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Contemporary Economics Series



陈昕 主编

当代经济学文库

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 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

袁志刚 著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袁志刚著. —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11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陈昕主编.当代经济学文库)
ISBN 978-7-5432-3072-9

I. ①非… II. ①袁… III. ①非均衡经济-应用-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37187 号

责任编辑 郑竹青

装帧设计 王晓阳

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
袁志刚 著

出版 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刷 苏州望电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5
插页 3
字数 197,000
版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32-3072-9/F·1263
定价 62.00 元

主 编 的 话

上世纪 80 年代，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三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本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学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内外著名高等院校最新的经济学通用教材。

20 多年过去了，本丛书先后出版了 200 多种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研究范围、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完成了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二是培养了整整一代青年经济学人，如今他们大都成长为中国第一线的经济学家，活跃在国内外的学术舞台上。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将继续引进翻译出版国际上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加强中国经济学家与世界各国经济学家之间的交流；同时，我们更鼓励中国经济学家创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在自主的理论框架内消化和吸收世界上最优秀的理论成果，并把它放到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进行筛选和检验，进而寻找属于中国的又面向未来世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理论，使中国经济学真正立足于世界经济之林。

我们渴望经济学家支持我们的追求；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陈昕

2014年1月1日

再 版 前 言

格致出版社忻雁翔女士告知我,“当代经济学文库”拟再版《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约写几个字。拙作初版于1994年,迄今已有26个年头了,这段时间,无论是中国经济还是中国经济学,其发展一日千里。20多年前的东西现在看起来不免有点幼稚,羞于再拿出来展示。就像成年人不愿意将自己婴孩时期露出屁股的照片拿来示人,是同样的道理。作为经济学人,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因为我们是在中国经济学发展比较封闭和落后的时代开始接受经济学,经济学的基础训练相当不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经济学研究成果今天看来难免带有落后和成熟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又是非常幸运的,我们能够跟随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一同前进,亲身参与了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因此,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记录的角度,从了解中国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实践过程中苦苦探索的角度,这样一本书的再版或许还有那么一丁点儿意义。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我学习经济学的第40年。遂借本书再

版的机会,将我的求学过程,与非均衡理论结缘的过程,非均衡理论研究与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探索相结合的过程,做一描述。

一、我的就学之路:从杭州西湖之畔到巴黎塞纳河左岸

十年“文革”,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损失巨大。百废待兴的中国,恢复高考成为最为迫切的事情。1978年春天经过“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我有幸迈入杭州大学的校门,成为“77级”的一员,步入经济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两年。1984年我进入复旦大学经济学系西方经济学专业开始硕士研究生学习,师从宋承先教授。我的本科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一部《资本论》带我进入经济学的研究和思考,可以说是《资本论》锻炼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并用《资本论》的方法去体悟各类社会现象。进入复旦后,我开始接触全新的西方经济学。那个时期我们学习经济学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因为规范的经济学研究在国内还处于空白状态,而接触外国各种经典理论和前沿理论的机会又不多。在此期间,在茫茫的外文书海之中,一本由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Jean-Pascal Benassy)教授写的著作《市场非均衡经济学》深深地吸引了我。真可谓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深感于这一理论对于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中国深刻意义,我准备用西方非均衡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作为我的硕士论文选题。我在撰写硕士论文的同时,翻译了贝纳西的《市场非均衡经济学》一书,后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借该书的出版,我写信给贝纳西教授,一是请求他写个中文版序言,二是希望硕士毕业之后去法国学习,跟随他继续非均衡经济理论的学习。1988年,我争取到国家教委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的名额,应贝纳西教授的邀请,负笈法国巴黎,注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 de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而实际在巴黎最好的大学之一——巴黎

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的“DELTA”^①经济研究所(即今天的“巴黎经济学院”)工作。那里聚集了一批法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除非均衡经济学领域的创始人之一贝纳西教授之外,还有后来撰写了《21世纪资本论》的皮凯蒂的老师、公共经济学领域的格斯纳里(Roger Guesnerie)教授,后来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教授(他成为我博士论文的签名导师),以及宏观经济学家马兰沃(Edmond Malinvaud)教授等。

我的主攻方向仍然是非均衡经济学。198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纳(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一时洛阳纸贵,影响很大。书中“投资饥渴”“扩张冲动”“父爱主义”“软预算约束”等词语把当时的经济问题刻画得入木三分,一下就成了那个时代经济学界的流行语。这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出现供给不足、物资普遍短缺?这种解释的必然推论是,“短缺经济”是与公有制相联系的、根本的制度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基因缺陷,难以解决。但是,科尔纳的短缺经济理论更多地是一种特殊情况的研究,缺乏系统性论证,也缺乏对更多非均衡情况的考虑。对此,非瓦尔拉均衡的分析框架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广、也更好的分析视角。非均衡理论源于凯恩斯的《通论》,后经帕廷金、克洛尔、巴罗和格罗斯曼等人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相当的发展和影响。到80年代初,贝纳西成为这个领域的集大成者。

留学期间我意识到,长期以来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坚守着“假定所有的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的瓦尔拉模型”,但同时人们都不得不承认,非均衡是市场的常态现象。基于我对中国经济现实的思考,感受到非均衡现象对于处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体系而言是长期存在

① Delta,三角的意思,此处表示该经济研究所由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三家共同举办,教授和研究人员也来自这三家机构。

的,中国经济中的许多价格曾经是固定的,失业状态和某些重要市场的短缺曾长期并存,而且在当时迅速展开的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双轨制经济体系的推行使得非均衡的现象呈现出更加独有的特征。1993年,在贝纳西教授的精心指导下,我完成博士论文。1994年,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的《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及其在中国经济中的应用》一书,收录在陈昕主编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文库里。1997年该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

二、我的治学之路: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

留学期间和回国伊始,我的脑袋里始终装着两本书:一本是西方经典的经济理论,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另一本是中国丰富的经济现实,融到血液里的、属于中国人的经验和感悟。五年求学,通过思学相长、融会贯通、上下求索的过程,我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应该能有助于理解中国问题、探索中国实践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随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不同,我的研究兴趣和重点也随之发生变化,下面我分别从三个不同时期、不同研究重点的角度叙述我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效率及其问题的理解。

1. 非均衡理论与中国失业与社会保障问题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一直是我关心和研究的重点。自90年代中叶起,将原来计划经济下被动行为的企业改造成追求经济收益最大的微观经济组织,必然导致原来处于隐形失业状态的劳动力大量被释放,成为显性失业人群。当失业问题在中国日益严峻时,我逐步把精力放在失业问题的研究上。宏观经济非均衡模型主要研究三大非均衡:凯恩斯失业均衡、抑制性通货膨胀(即短缺经济)均衡和古典失业均衡。尽管三种非均衡状态的基本前提是固定价格假定,但是它们的形成机制不一:古典

失业是由价格机制僵化而导致的；凯恩斯失业由总需求普遍不足所导致；抑制性通货膨胀则是供给不足所引起，具体如科尔纳所描述的经济主体软预算约束所导致。但是，中国经济很难完全与这三种非均衡状态中的某一种相对应。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是一个失业经济，7.5 亿劳动力，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启动总需求扩张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但是，在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不能完全替代的情况下，即使启动总需求也无助于经济水平的提高，资本短缺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同时，由于计划经济带来的制度扭曲，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十分严重，瓶颈产品到处存在。90 年代中叶，正是由于总需求的过分扩张，在增长动力重启时，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过热，引发两位数(21%)的高速通货膨胀。一般说来，一个存在大量失业的经济是不可能出现大规模通货膨胀的。面对中国宏观经济错综复杂的状态，非均衡理论经过适当修正可以很好地用来描述和揭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根本问题，从而提出对策性建议。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原理是：第一，做对激励，做对价格信号；第二，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将高比例的国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第三，在不同阶段启动总需求中极为重要的消费需求(食品、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汽车和住房)；第四，融入全球化，出口导向推动经济增长。这时，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开始显性化，工人大规模下岗，农村劳动力进一步涌入城市，多元劳动力市场开始在中国形成，失业问题一时成为重大社会问题。如何分析当时失业的各种成因，形成促进就业的对策，需要我们很好地进行研究。1997 年我完成《失业经济学》一书，该书同样收录在“当代经济学文库”里。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问题在中国宏观经济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但是，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导致的人口结构改变，带来一系列新问题：2004 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出现劳工短缺，工资上升；家庭的低抚养率导致高储蓄，消费不足；旺盛的投资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但是投资效率有待提高；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老龄化加剧导致养老保险账户不能平衡。2000 年前后，我将宏观经济研究转向消费、投资和中国经济

增长是否动态有效等问题的讨论,以及对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研究。

如果说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是从劳动力市场的角度去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话,那么对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问题则是从人口结构、储蓄率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效率。我的研究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角度阐述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出现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并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具体机制,那就是: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必将通过利率或养老保障的代际转移总额来影响第一代退休以后的消费水平,进而提高他们的储蓄率,而中国未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由于内需和创新的不足、金融市场改革的滞后,中国居民的储蓄并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个人最优储蓄率也就偏离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律。人口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解决未来中国养老保险可持续的关键,而不是单纯将养老保险体系从现收现付制转向个人基金制就能够解决这个难题。2000年前后我的这些观点多次在《经济研究》和其他刊物上发表,2005年由我主编的《养老保险经济学》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6年修订版在中信出版社再次出版。

2. 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和经济转型的研究(21世纪初期)

在研究了失业和社会保障等宏观经济问题之后,我开始逐渐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机制及其对国民福利的影响。我发现,在繁荣的宏观经济运行的背后,存在着许多严峻的结构性矛盾,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机制上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果不通过进一步改革加以解决,将会演变成经济发展中随时爆发的危机。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是一种奇迹。首先,中国的人口红利和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造就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比较优势。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和廉价的劳动成本吸引了大量FDI进入,使得中国迅速融入全球产业链,与国际资本和技术相结合,爆发出巨大的生产能力。FDI的流入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资本积累,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管理和人才,使得本国的企业通过“干中学”的

方式迅速与国际前沿生产技术接轨,对中国经济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自 90 年代以来呈上升趋势。其次,在人口红利期,由于家庭负担下降,家庭储蓄率上升,高额储蓄通过金融体系转化为投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长期维持在 30% 以上的高水平。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是推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原因。而开放带来的信息流入,使得中国可以迅速吸收国外技术,并结合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在有些领域(如互联网支付、高铁、5G 技术和人工智能等)甚至实现弯道超车。

供给与需求的有机配合使得中国经济在 2001 年后迎来了长达七年之久的高速增长。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从理论上说,消费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注重消费对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拉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40 年历程中,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阶段上,正是中国居民的消费增长打开了供给侧投资的空间。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许多改革措施从供给侧着手,为此后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在需求侧打开了居民消费增长的新空间。这些改革包含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税制改革、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改革、1998 年的城市住房体制改革、国有银行不良资产清理和股份制改革,以及中国坚定不移地加入 WTO。这些改革的完成,使得中国经济再一次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分税制改革助推了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展开的区域竞争;“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催生了民营企业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城市住房产权制度改革与交易为居民消费升级、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及土地金融打开了新通道;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呆账坏账的清理,为后面金融机构的轻装上阵以及金融扩张做好了准备;最重要的是,加入 WTO 之后,我们迎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这使得中国工业企业充分融入全球产业链,并带来投资的大量增长和 TFP 的提高。外贸出口的高速增长,为我们带来了贸易顺差和外汇积累,此后外汇储备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重要的资产端来源,最高时外汇储备达到 4 万亿美元之巨,为日后的基础货币发行及其金融扩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外汇储

备的增加,一方面体现了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力的大幅增强,导致人民币经历了长期和持续的升值。汽车和住房的消费以及由此引发的城市建设,使得中国产业发生从轻工业到重化工业的结构性转变。另外,随着2000年以后福利分房制度的终结和户籍制度的松动,住房建设、土地拍卖、城市交通和环境改善在市场机制下产生良性的互动,既满足了人民对住房和环境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又通过土地拍卖筹集到城市建设的资金,由此构成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的投资高潮。而住房、城市交通和环境建设又进一步引发对钢铁、水泥及其他建材等重化工的投资,形成中国此后GDP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从需求看,2001—2008年间推动经济增长的是汽车和住房消费的增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重化工投资的增长,以及外贸出口的增长。从供给侧看,是人口红利、制度红利、土地红利、赶超红利和结构红利等诸多红利的又一次充分释放,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是,在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潜在的矛盾也在悄然积聚,原来适应经济形势所制定的政策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也逐渐衍生出制约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第一,经济体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和全球经济的非均衡运行。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由于全球产业链与全球分工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价格的差异导致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出口贸易迅速增加,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成为世界工厂,外需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此全球化的结果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贸易逆差的巨额积累,而中国则是贸易顺差的巨额积累,形成可观的外汇储备。这其实是全球经济非均衡的表现,长期而言,是不可持续的。供求非平衡源于深刻的全球分配问题,全球化尽管带来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但是也引致了地区的分化、国家的分化以及阶层的分化。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都只是在金融领域采用量化宽松的办法进行治理,这样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导致了全球资产泡沫、资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引发全球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危机。所以,当中国经济增长到一定规模时,内需必须上升,增长的需

求动力必须得到转换。第二,伴随着城市化过程的房地产泡沫、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环境恶化等问题明显。分税制改革后,以地方房地产发展为基础的土地财政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激励和财源,是一种典型的发展型财政。1998年的住房制度改革尽管推动了中国房地产业的充分发展,但地方财政改革与土地市场改革的滞后在短期却引发了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升,致使房地产发展泡沫化,在中国经济如火如荼的发展中埋下潜在的隐患。此外,发展型财政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使得地方政府的其他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供给不足,环境和能源等问题被忽略,不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持续,需要未来的城市化和市民化过程进一步解决。第三,第三产业领域市场化改革滞后导致服务业效率低下以及要素配置扭曲。中国的服务业长期被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垄断,效率较低,抑制了中国内需的增长。此外,中国的要素市场改革相较产品市场更为落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扭曲严重降低了要素配置的效率。一方面,中国投融资体系将金融资源分配到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制造业三个部分,导致房地产泡沫的发展,地方政府债务的累积以及制造业产能过剩下的萎靡不振,金融体系无法真正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主导金融体系下的金融抑制和“政治优序融资”使得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从正规金融部门融资较困难,金融没有发挥应有的配置资源的功能,从而降低了配置效率。第四,受户籍制度、公共产品短缺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农村人口不能大规模转移进入城市,以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得到完全释放;而农业的现代化经营问题又尚未解决,使得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低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新空间被严重限制。第五,改革开放40年,政商关系日趋复杂。中国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农业和轻工业的产业特征相对简单,对制度的要求也低,企业家只要遵循“消费者是上帝”就可以了,全球产业链背景下出口产品的生产、标准和规则由国际制定,也相对简单。过去40年的改革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实验—推广,“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一旦当经济发展到了本国房地产、重化工和金融等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对制度

的要求就会提高,权力与市场的关系变得复杂,既得利益阶层迅速形成,以往的实验—推广模式将越来越难,改革的阻力也会越来越大,要获得制度红利将会比过去更加困难。未来,我们既需要一定的“顶层设计”克服既得利益的牵绊继续推进改革,又需要一定的制度灵活性保持地方改革的激励与勇气。

3. 资源错配、结构扭曲与金融体制改革研究(2008 年至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增长速度逐渐下滑,宏观负债率不断上升,金融风险不断累积,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我对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思考和理解又有新的深化,更加关注全球经济非均衡之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问题。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分水岭。其实,在 2008 年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矛盾在上一轮高速增长中已经有所显现,只不过被当时的高速增长所掩盖。在长期的供给侧因素方面,自 2004 年起,中国就出现了“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开始显现,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为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一方面,劳动者就业和收入状态的分化扩大了国内收入差距,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消费不足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依靠出口消化,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度不断提高。与此同时,1998 年之后中国经济中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经济增长中的货币因素越来越重要,以至于 M2 占 GDP 的比重迅速超过 200%。

2008 年金融危机是中国资产负债扩张“挤入”或是“挤出”两个阶段的重要分界线。1998 年住房制度改革之后,随着城市住房和土地价格的上升,基于房产和土地抵押的资产负债扩张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发展的核心动力,资产负债扩张对实体经济主要发挥“挤入效应”。在融资需求受限情况下,资产价格的提升,甚至是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可以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对实体经济产生挤入效应。但是 2008 年后,为应对经济增速下滑推出的包括“4 万亿计划”在内的一系列货币与财政刺激方案,使得总需求越来越依赖基础设施建设与房地产投资,制造业发展的动力不再。资产负债的持续扩张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挤出效应。

金融扩张单兵突进,但是其他配套改革措施和金融监管体系建设滞后,造成金融乱象丛生,金融资源被各类企业和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配置到投机领域,甚至传统的工业企业也将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作为自身利润的主要增长点。金融机构则纷纷减少商业贷款,以向房地产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表面高收益部门提供融资。而当运营现金流无法覆盖债务成本支出时,企业通过继续举新债以偿还旧债。不断累积的债务存量进一步增加了偿债风险,导致金融体系融资减少和企业投资下降。

由此可见,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中资产负债的发展是在经济结构扭曲和制造业投资下降的情况下展开的,房地产业通过泡沫化成为支柱产业继续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在房地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以土地财政为基础、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为杠杆,尤其以近年来迅速发展的影子银行,为逃避金融监管,继续提升杠杆率成为稳增长的主要力量。这些投资项目的实施已经在金融领域积聚起巨大的金融风险。更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发现,中国金融风险的积累反映了很多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性问题:国有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的软预算约束,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发展,国家隐性担保下的刚性兑付,这些因素导致债权融资市场价格信号混乱,投机部门对价格信号不敏感。此时,单纯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无法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更为严重的是,在虚拟经济高度发展并回报率居高不下时,在一定时期内,泡沫可以继续自行发展和实现,虚拟经济吸纳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甚至将经济中原本可以用于实体投资的资金也转移到虚拟经济以获取投机利润,导致实体经济融资困难。这时,金融风险问题已经积累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否则将会引发严重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出路,一是继续改革,向制度要红利;二是进一步对外开放,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冲破既得利益者的堡垒;三是充分打开需求侧的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在增长的过程中逐步消化过去10年积累的金融风险。一句话,改革与开放将是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根本动力。

我的这些关于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思考和观点,在发表于各类国内

外经济学杂志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中均有体现,包括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的十多篇论文和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世界经济》《金融研究》《学术月刊》等中文杂志及几本英文杂志上的百余篇论文,以及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资产负债扩张与实体经济增长》一书。2011年,我的研究成果《均衡与非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与转轨经济问题探索》入选首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4年英文著作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Long-Run Growth and Short-Run Fluctuation* 由新加坡的 World Scientific 出版社出版。在这些研究中,非均衡研究方法随处可见,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均衡”是我学术生涯的“终生伴侣”。是为再版前言。

袁志刚

2019年10月5日于青浦寓所

序

为本书作序,并且看到非瓦尔拉均衡理论的方法被用来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所发生的最为引人注目的经济变化,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同假定所有的市场都处于永恒的均衡状态的传统瓦尔拉模型相反,在最近 20 多年发展起来的非瓦尔拉均衡方法,能使我们以一种严密的方式研究所有种类的市场非均衡和价格机制的不完善。因此,应用非瓦尔拉均衡方法研究中国经济看起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除了自由市场以外,这个经济中的许多价格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固定的,而且长期以来人们在那里观察到失业(隐蔽的或非隐蔽的)和某些重要市场的短缺是并存的。

但是,非瓦尔拉均衡理论是一种极其一般的方法。为了引申出某些可操作的理论结论或政策处方,我们必须对所考察经济的特征作出具体的说明。迄今为止,人们主要研究了两种经济非均衡状态:资源的普遍失业——一种近年来可以在西方经济中大量观察到的情景,和与之相反的普遍短缺——一种被假定为在东欧国家经济出现的情景。然而,中国经济不与上述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相对应。此外,中国经济在向市